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农民、农村三个论断的辨析

林亦平, 滕秀梅

(南京农业大学 工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1)

摘要: 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剖析了“传统农业是低效益的产业、农民是低素质的群体、农村是低效率的区域”的片面性。中国传统农业之所以被认为是低效益的, 是因为没有认清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以及现代农业之间的关系, 没有结合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结构及其与农业有关的所有制进行考察; 而对中国传统农民是低素质的认识, 源于对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特殊作用的无视; 对农村是低效益的评价, 源于对城乡之间效率衡量统一指标的照搬, 并不完全符合农村的产业特点和其内部经济指标的情况。

关键词: 传统农业; 农民; 农村; 唯物史观; 辨析; 中国

中图分类号: F32;B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3)03-0078-05

"Three agriculture" from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point discrimination

LIN Yi-ping, TENG Xiu-mei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Marxism,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one-sidednes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s low-efficiency industries, farmers is the a group with low quality, and rural areas is of inefficiency". Because people did not recogni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family farming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China'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was considered to be unproductive. Ignoring farmers' contribution in the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raditional Chinese farmers was regarded as the group with low quality. Unifying the efficiency measures indica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led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area.

Key word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peasants; rural are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scrimination; China

长期以来, 学术界和政府机构对中国“三农”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从研究视角而言, 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等领域介入的多, 从哲学层面探讨的少。很多人都认为农业是低效益的产业, 是现代化建设的负担和包袱; 农民是低素质的群体, 对经济刺激反应滞后; 农村是低效益的区域, 对社会发展常常造成制约和影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人们认识、把握事物本质的基础。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具创新性, 是认识和正视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为此, 笔者拟运用唯物史观,

剖析“传统农业是低效益的产业、传统农民是低素质的群体、农村是低效率的区域”的观点, 以利于国人理性认识与把握农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农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农村在社会发展中的空间。

一、“传统农业是低效益的产业”辨析

受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的影响, 早期的经济理论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部门, 强调工业的作用, 而视农业为传统固定不变、停滞的低效益产业, 农业发展方向和速度受制于工业发展的部门。这些理论包括配第·克拉克法则、罗斯托对经济成长阶段的阐述、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罗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等。受这些理论的影响, 大多数发展

收稿日期: 2013-05-21

作者简介: 林亦平(1965—), 男, 江苏常州人, 副教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农村经济。

中国在发展战略上普遍都有对农业的不重视、发展战略的重点放在工业化上的倾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经济发展建立在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超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之上,依靠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来压低农产品价格。

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与面貌。把握农业的产业地位需要以所有制及其产业特点为基础,同时结合相联系的制度、政策等社会存在因素来加以认识。认识中国的农业不能简单复制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基础上认识农业的方法与解决农业问题的思路,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结构及其与农业有关的所有制形式来进行考察。

传统农业之所以被认为是低效益的,主要在于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将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作为中华古代文明根基的传统农业,走过了几千年漫长的历程,今天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既说明了传统农业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也反映出中国农业发展的艰难和缓慢;小农经济体现的则是一种发展形式与规模。如果孤立地审视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甚至将其合二为一,必然在实践中走向误区。

在对传统农业低效认识的另一面,是对所谓现代农业的称道。其实两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代农业必然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而不是全部否定,如中央政府始终强调“一亩三分地”式的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因为它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适应采取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中国传统农业是相对于现代农业的一种生产状态,前者着力于农业体系自身的体制内的发展,后者则着力于体制内外的结合,运用非农技术来支撑农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与现代农业的差异不是由传统农业自身所带来的(事实上,现代农业的特点往往又是外来因素刺激所形成与发展的),而农业经济的落后与停滞却往往又是经济自身以外的制度所带来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农业被认为是“停滞”和“平衡”乃至缺乏活力的一种典型,这种“停滞”

和“平衡”与小农经济的特点相似或者一致,因而一般就倾向于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结论。实践中的许多政策、措施如用城镇化的手段强制压缩农业耕地逼使技术输入来达到与实现对传统农业改造的目标都是基于这种认识和选择。这种认知是建立在两个判断的基础上的,一是“均衡”与“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形式(如传统农业、小农经济等)内部系统结构所致;二是要打破“均衡”只能是改变其“均衡”的量的规模与状态。事实上,任何事物的内在结构都不是孤立的,往往与其功能和外在环境相联系。同时,“均衡”状态的量的改变(放大或者缩小)也未必是事物良性发展的唯一途径和因素。

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来研究农业发展战略的思路,西奥多·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指导具有针对性与现实性。按照西奥多·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的认识,传统农业之所以处于一种特殊的“停滞”状态,在于其缺乏外在的条件、技术以及制度的刺激。因而,舒尔茨反对轻视农业并反对盲目发展大农业,同时非常注重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他主张建立一套适合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包括各种不同的活动、结构以及具体的活动规章制度,运用农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来刺激农民,不要建立大规模农场,要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适合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等。

自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以来,无论是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还是在李嘉图的国民分配理论中,传统农业都是没有地位的。这种结论往往是与工业生产为背景的所有制有关。正如列宁以后在认识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中所指出的那样,“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

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恩格斯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②

显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对传统农业的分析及判断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农业系统以外的制度如土地所有权等基础上的。除此以外找不到可以论证一种经济形式必然具有一种天然的停滞与落后的理论表述和实际论证。事实上,传统农业的低效益是相对的。在历史上,传统农业造就了民族的文化根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经济支持力量,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传统农业的框架内,使农业的经济效益和改革的示范效益得以彰显。

二、“农民是低素质的群体”辨析

很多人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愚昧、落后,对经济刺激不能作出正常反应。舒尔茨否定了这种观点,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传统农业是一种贫穷但有效率的产业。”^③他认为,欧洲、日本、墨西哥等国就是通过对农业的改造而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同时,他根据社会学家对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撒尔和印度的赛纳尔这两个传统农业社会所作的详细调查的资料证明,“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④这就是说,“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并不愚昧,他们对市场价格的变动能作出迅速而正确的反应,经常为了多赚一个便士而斤斤计较。通过他们多年的努力,使现有的生产要素的配置达到了最优化,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要素并不能使生产发展,外来的专家也找不出这里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有什么低效率之处。”^⑤很显然,舒尔茨认为,对传统社会中农民的认识和评价,必须结合所处外部环境和条件。而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则更需要结合历史基础与现实因素来理性审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与动力作用。

首先,从历史角度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必将伴随着对农民的改造和变革。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被视作现代化的阻力而被消灭的,

作为特定阶段的阶级,始终被视为“历史的弃儿”和历史的绊脚石。著名比较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认为,正是对小农的消灭,“这一结果对和平民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它意味着现代化能在英国顺利进行,而不受巨大的反动保守势力——这种势力存在于德国、日本的某些领域——的干扰”。但同时,巴林顿·摩尔又指出:“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这里农民再次作为主要动力推动一个政党而取得了胜利。”事实上,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这是对民主革命时期农民的历史作用的概括。农民作为封建革命的主要动力,而其本身具有封建性质的宗法群体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农民是无法解放自己的,也就是无法革自己的命。这个自身似乎无法解决的矛盾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中得以解决,并且在极大地释放了革命的热情的同时还发挥了其动力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并且实现了农民自身没法解决而又是根本需要的土地权益问题。同时,正是在对农民利益正视和实现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飞跃。

其次,从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现实角度来看,历史发展总是有些相似之处。今日中国农民虽然早已不是过去的宗法农民,可他们在现代化中的处境似乎与民主革命时期农民的处境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依靠力量,这是已经公认的历史事实;同时,现代化的本质又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又总是伴随着农民的转化和数量减少的,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则又是现代化的变革对象。但是基于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动力的历史作用,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启动和发端的现实作用,同时考虑到中国农民的现实和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状况等等,一般意义上的依靠和变革对象的定位很显然是没法完全概括和真正反映农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及其作用的。

当然,对农民是低素质群体的判断,尽管在今天已不再是理性的选择,但却仍然表现为一种情感

倾向(甚至包括农民自己)。究其本质而言,这种认识与情感既来自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及其立场,也来自于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比较利益的差距。很显然,这两方面原因与群体素质高低并无必然的联系。事实上,从历史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起和“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再到新农村建设中的“集体失语”,都证明一点:问题不在于农民素质的高低,而在于人们认识和研究农民的方法和立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作为伟大历史运动的群众实践,是惟一能够解决一个民族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的历史冲突的伟大力量。在分析资产阶级革命不成功的原因时,马克思说“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⑧所以,只有反映群众的利益,尊重其地位,得到其拥护,革命与建设才能取得成功。

三、“农村是低效率的区域”辨析

依照隐蔽失业理论即“零值农业劳动学说”的观点,传统农业中有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是零,也就是说,尽管这些人在干活,实际上对生产毫无贡献。这种就业实际上就是隐蔽失业,把这些人从农业中抽走,并不会使农业生产减少。这种理论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著名发展经济学阿瑟·刘易斯和罗森斯坦·罗丹等人都是这种理论的倡导者。舒尔茨详细分析了这一理论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并根据印度在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劳动减少是农业下降的事实证明:在传统农业中,农产量的增减与农业人口的增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所以“贫穷社会中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⑨

从理论上讲,作为经济学概念,效率指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同时,就影响效率的因素而言,一方面,在于累加、延续的外部支持的力度与角度;另一方面在于产业或者区域的内在各要素构成的结构和比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至少

在理论上并不存在一个绝对低效率的产业或者区域。效率的高低与大小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和基础上的。

从实践来看,农村的低效率是相对于城镇的高效率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的低效率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

从效率指标来看,城乡之间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效率衡量指标。长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实践,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使用“城市”与“现代”的视角来审视和解决农村问题,并且以此来衡量和判断农村乃至所有行业的效率高低。事实上,经济增长等效率指标体系和城市建设的实际经验,在实践中并不完全符合农村的产业特点和实际生产、生活等状况。

从影响效率的因素来看,一方面,如果作一个规范分析的话,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质量、技术的先进程度、制度的适应性等影响效率最关键的因素在实践中是与公共服务的外溢相关的。但是问题在于,基于工业化相关政策与战略的选择,这些关键因素在农村得到公共服务的外溢却往往少于城市所得到的外溢,这是最终造成农村效率更低的外部原因;另一方面,从内部因素来看,产业的内在要素结构与构成方式往往是效率产生的基础与依据。就要素构成而言,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程度往往决定了效率的张力,但在农村,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土地)之间基于比较利益的低下与某些公共利益的需要,呈现更多的是分离、分割的状态,自然也就缺乏效率的基础。

因此,综合看来,农村的低效率是相对的。无论是在传统时期还是在现实阶段,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产业本身,而在于人们选择并实施了何种效率机制的问题。在实践中,如果离开效率的前提与机制来认识农村的效率,甚至牺牲农村的发展来换取城市的效率与繁荣,那么农村的发展必然会长时间表现为“绝对”的低效率。

总之,马克思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理论基础,形成与确立认识与解决人类社会历史与现实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是正视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理论基点。在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进程中,“三农”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农民在新

农村建设中的集体失语”、“农业在一片加强中削弱”、“农村在一片发展中萧条”等现象值得深思：准确认识与把握事物的本质是切实解决问题的前提；中国的“三农”问题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前提，而西方则相反，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成果却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和手段。这些社会存在的差异，必然决定了中国“三农”问题的表现、解决路径的特殊性，切不可简单复制与移植。

注释：

-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页。
- ③ [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3页。
- ④ [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页。
- ⑤ [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页。
- ⑥ 李培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问题的特殊性》，《理论导刊》，2001年第1期。
- ⑦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183页。
-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104页。
- ⑨ [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4页。

参考文献：

- [1] 曾长秋.近20年国内“三农”问题研究综述[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87-90.
- [2] 李方祥.农民文化传统与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5)：8-12.
- [3] 林丽英.农民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切入点的原因[J].湘潮，2008(4)：56-57.
- [4] 刘伯霞.中国农村30年改革的回顾、反思与展望[J].学习与实践，2008(12)：23-32.
- [5] 郭书田.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的基本经验[J].河北学刊，2008(7)：1-6.
- [6] 党国英.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模式的转变[J].社会科学战线，2008(2)：19-24.
- [7] 常生君.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经济学条件及实现的基本路径[J].新西部，2009(2)：17-18.
- [8] 张新光.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08(4)：95-98.
- [9] 白荣欣.略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及面临的矛盾[J].经济问题，2008(2)：75-76.
- [10] 何磊.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制度障碍及其变革[J].未来与发展，2010(4)：9-13.

责任编辑：曾凡盛